从组合关系看词义

郭 玲 玲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是语义场中的两种基本关系。传统训诂学对类聚观念有所认识,但对组合关系重视不够。很多词的词义不是在聚合关系中发生变化的,而是在组合关系中变化的。在组合关系中分析词义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传统的训诂方法解释力更强。传统训诂学在发展中可借鉴现代语义学的有关理论。

[关键词] 词义; 组合关系; 语境; 随文释义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078-04

周祖谟先生说:“训诂学就是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问。旧日只看作‘小学’的一个部门,现在正逐渐发展为一门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今后的训诂学从理论上和从实用上都会向建立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的方向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汉语训诂学”)。这里揭示了训诂学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

语义学(semantics)最早是在十九世纪由德国学者莱西希提出来的,他主张把词义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现代语义学既研究词义,也研究语义(包括词组、句子所表达的意义)。语义学把词汇和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现代语义学对词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义位”和“义素”的概念。

训诂学材料丰富,有许多优秀成果。“词以类分,同类而聚集,这就是一种聚合,因而在早期训诂材料的纂集里,就已经存在着语义学所说的‘语义场’观念。”^[1]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训诂学缺乏理论。传统语言文字重视在类聚(聚合关系)中研究词义,忽视组合关系(语境)。语义中恰恰强调对两方面的重视,要求更全面,不可偏颇。

语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英国语言学家弗斯把语境分为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和由非语言因素构成的“情景的上下文”。陈宗明在《逻辑与语境》中把语境分为“言词语境”和“社会语境”。^[2]前者是狭义语境,后者为广义语境。我们这里讨论的组合关系属于狭义语境。

关于语境对词义的影响,一些语言学家已关注到这个问题。王力先生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中说:“法国语言学家房特里耶斯说过:‘确定词的价值,是上下文。’”“尽管词可能在意义上有各种变态,但是上下文给予该词独一无二的价值;尽管词在人们的记忆中积累了一切过去的表象,但是上下文使它摆脱了这些过去的表象而为它创造一个现在

的价值。”^[3]苏宝荣先生在《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中说“语义(词义)在特定的语境中得以显示,又在语境的制约中演变和发展。”^[4]

一 研究词义以义位为单位

义位是属于语言的深层结构的,反映人们思想中对客观事物的分类。一个词可以只有一个意义,但多数情况下有多种意义。每一个意义称为一个义位。“义位”大体相当于字典上所列的义项。(前提是区分词的同源性^[5])蒋绍愚先生在《古汉语词汇纲要》中认为:词是词义系统的“分子”,义位是词义系统的“原子”。研究词汇,应以义位为基本单位。义位的划分重在对话义的理解。义位划分是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词义(尤其是同义词、反义词),在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等问题时,也不能笼统地以词义为单位。此外,对于消除传统训诂学中的一些模糊、不精确之处也很有帮助。如王力先生《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中讲到的“偷换概念”的问题。

语义学的显著特点是它的概括性,而这正是言语义根本缺乏的。蒋绍愚先生把“这些由上下文而显示的不同意义”的言语义称为“义位的变体”。“出现在具体上下文中的都是义位变体,而义位变体的概括才是义位。”他认为划分义位要考虑“中心变体”,因为“中心变体的意义就是这个义位的中心意义。”^[6]

二 义位在交际中组合起来

首先,为了交际,义位必须组合。这是显示组合关系的必要性。贾彦德先生在《汉语语义学》中认为,“语义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作为交际的内容体现人的思想。说话人为了使语义体现思想,必须将义位组合成自由义丛、句义乃至言语作品义。”^[7]

[收稿日期] 2008-01-16

[作者简介] 郭玲玲(1983-),女,河北邯郸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其次,义位的性质决定义位可以组合。这是形成组合关系的可能性。贾彦德认为义位主要分成三类:一类反映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这类义位与语法中的名词相应;一类反映万事万物的性质特征,与形容词相应;还有一类是反映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行为、状态的,与动词相应。因为义位是对原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象及其性质和变化,从三方面分割开来反映的结果,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义位和义位又是可以组合起来的。

三 词义的语境显示

(一) 词的组合关系影响词义

在词汇体系中,词与词之间存在复杂的语义联系,一个词的意义既依赖于它的同义词和跟它属于同一“义类”的其他词,也依赖于在使用中跟它相结合的别的词。词的组合关系,简单的说就是词的搭配关系。多义词的各个义项,只有凭借一定的语境才能得到显示而予以确认。如现代汉语中的“打”。张永言先生在《词汇学简论》^[8]中所举的例子,“伟大”的意义不同于“巨大”、“宏大”或“庞大”;“熟人”、“熟客”的“熟”跟“熟饭”、“熟铁”或“熟睡”的“熟”由于结合的词不同,意义就很有出入。

词义的结合不是随意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比如在先秦,“醒”不能选择和“睡”、“梦”等词结合,构成“睡醒”、“梦醒”等语义结构,因而在先秦的作品中,不可能见到这样的词语。洪成玉先生在《训诂学和语义学》^[9]中还举到现代汉语的“开”。“它只能选择表示能够开动或开启的词义相结合,如开口、开眼、开门、开窗、开心、开花、开船、开枪、开机器等等,不胜枚举。但‘开’不能选择‘耳’、‘鼻’、‘草’、‘木’等词义形成语义结构。如果能把每一个词义所能选择的已有的词义结构整理出来,对认识词义的总体面貌无疑是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从一个例子来看看词是怎样在语境中改变词义的。^[10]

《说文解字》:“篁,竹田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1]:“《战国策》:‘荀丘之植,植於汶篁。’《西京赋》:‘篠簜敷衍,编町成篁。’《汉书》:‘篁竹之中。’注:‘竹田曰篁。’今人训篁为竹,而失其本义矣。”

《龚氏段注札记》:“起于六朝诗‘初篁苞蓊’,当是古由此别一义。”谢庄《月赋》“若乃凉夜自凄,风篁成韵。”《说文通训定声》^[12]:“……注:竹丛生也。”《楚辞·九歌·山鬼》:“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说文解字义证》^[13]:“注云:‘篁,竹丛也。’”《说文通训定声》:“注:‘竹林也。’”《郾馆公燕诗》“当阶篁筱密,约岸荷蕖长。”这里“篁”也是指“竹”。

“篁”可以是长满竹子的地方“竹田”(如“编町成篁”),后也可指竹田所长之物“竹”(如“风篁成韵”)。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组合关系对词义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重视组合关系,把词放回语境再提取词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词义是客观存在的,组合关系影响词义、确定词义,甚至使词义发生变化,但并不能凭空创造词义。正像王力先生所说“我们应该让上下文来确定一个多义

词的词义,不应该让上下文来临时‘决定’词义。前者可以叫做“因文定义”,后者则是望文生义。”^[14]

再看《辞源》^[15]中对“解”(jie3)的释义:

(1)剖开,分割肢体。(2)分散、分裂。(3)解开,消散;(4)脱去,排除;(5)分析,解释;(6)晓悟,理解;(7)懂得,知道;(8)通达;(9)排洩。

我们从一些例句来具体分析。

[1]宰夫将解鼈。(《左传·宣公四年》)

[2]庖丁为文惠公解牛。(《庄子·养生主》)

[3]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墨子·节葬》)

[4]木性如竹,紫黑色,有纹理而坚,工人解之以制博弈局。(唐刘恂《嶺表録异》)

主体 + 解 + 受体

(有生命的) (有生命) 工具(刀)(具体)

“解”的对象,[1][2]指动物(“鼈”、“牛”),[3]指人(“长子”),[4]指植物(“木”)。

特征:整体——部分。这是物理形态的变化。

[5]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国语》)

主体 + 解 + 受体

(有生命的) (无生命) 工具(抽象)

这是从社会关系角度看,所有权归属的划分,还具备由整体到部分的特征。

[6]土崩瓦解

主体 + 释

(无生命) 非自主

特征还是由整体到部分的关系

[7]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吕氏春秋·孟春》)

[8]太后之色少解。(《战国策·赵策四》)

还有词组“雾解”的“解”也是这一类。特征:聚合——离散(动态的过程)。

[9]子墨子解带为城。(《墨子·公输》)

[10]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

[11]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韩非子·难一》)

[12]解屣不敢当阶。(《礼记·曲礼上》)

特征:系结——打开。这里存在语义间细微的变化。“解”慢慢朝“脱、除”方面演变。“脱”不是重点,打开是重点。语义由隐到显。凸显的词义因素变了,词义就会发生变化。

[13]鹿角解,蝉始鸣。(《吕氏春秋·仲夏》)

还可以表示“排除”、“消除”、“排泄(除)”的意义。如:

[14]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荀子·臣道》)

[15]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系辞下》)

[16]人中于寒,饮药行解。(《论衡·寒温》)

又有解释、说解、讲解、辩解之义。当“解”当“解释、说明”义时,不再是单纯的行为动词,而是言语动词。如:

[17]以不惑解惑,復于不惑,是上大不惑。(《庄子·徐无鬼》)

又有“通达、了解、明白”之义,如:

[18]大惑者,终身不解。(《庄子·天地》)

[19]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

“了解”、“明白”,是个心理动词了。

词性	语义特征	关联	变化状态	
动作动词	整体——部分	大——小 (形状)	静态	相
	聚合——离散	大——小 (浓度)	动	
	系结——打开	隐——显 (具体)		
言语动词 心理动词	隐藏——显现	隐——显 (抽象)	态	通

看“解”字的来源和发展似乎存在因果关系。对于词义的语义特征,要深入地分析,分得越细越明白。很多词的词义不是在聚合关系中发生变化的,而是在组合关系中变化的。在组合关系中分析词义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传统的训诂方法解释力更强。组合研究方法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不重视组合关系会使语言研究脱离本体。对于研究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态度是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来,关键是解释能力要强。在继承传统方法精华的同时,积极吸取对我们的研究有用的任何方法。

再看一组统计:

	解 jiě	解 jiè	解 xiè
《汉语大字典》 ^[16]	26	5	8
《现代汉语词典》 ^[17]	8	1	解 1 解 2 解 3
比例	31%	20%	31%

(《汉语大字典》简称《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代汉语》。“比例”指《现代汉语》义项占《大字典》义项的百分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部字典对“解”字的义项归并不是一致的。义位的归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解”的对象由“动物”到“植物”,算一个义位还是不同的义位。若在“植物”的基础上又扩展为“无生物”,义位又如何归并。这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样一个统计也提醒我们,必须进行词义消亡的研究。

在语义中观察相关成分的变化,对词的意义范畴进行分类,这对于词义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同类互证的方法,将特征相似的一组词甚至一系列词联系起来观察。如果能把每一组词所能选择的已有的词义结构整理出来,对认识词义的总体面貌无疑是有帮助的。比如,可以把与“解”相似的“分”、“析”、“释”等联系起来观察,甚至扩大范围到“剖”、“判”等。

动词在词义研究中很重要,吕叔湘先生就主张“动词中心说”。现在一些语言学学科点在集中研究动词,对动词再作下位分类,如:吃喝类、动作类、心理类、言语类等等。通过

研究动词,将它与其他词甚至虚词联系起来,进而可以更细致地描绘语言的面貌。

动词 (实词)	行为动词	动词词汇	实	语
	言说动词		法	
虚词	心理动词	语法成分	虚	化

(二)语境与随文释义的关系

训诂材料中数量最多的是具体释义材料,传注训诂以“随文释义”为原则。随文释义是解释言语意义的,它可以是词义训诂,也可以是文意训诂。而文意一般都不是词义范畴本身的内容,所以一般不必进入辞书训诂而成为义项条目。

下面看一个随文释义的例子:

《说文》:“微,通也。”

段注:“《孟子》曰‘微者,微也。’郑注:《论语》曰:‘微,通也。爲天下通法也。’按:《诗》:‘微彼桑土’,传曰‘裂也’;‘微我牆屋’,曰‘毁也’;‘天命不微’,曰‘道也’;‘微我疆土’,曰‘治也’。各随文解之,而‘通’字可以隱括。”

“微”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各随文解之”。这些释义基本上是从“文意”训诂材料中辑录或稍加整理而来,未能将词的概念义阐释出来,离开具体语境就行不通了。一般来说,传著训诂贵专别,辞书训诂贵贯通。“通训”常常可以将随文所释之义贯通起来。在“微”字的释义中“通”义可谓是“通训”。有时候“随文释义”是训诂家用他当时的语言中的某个词来转换被训释的古词。如“为”在古代汉语中是一个意义高度概括,适用范围宽泛,特异性灵活的广义词。在古书中许多“为”字可载换为“治理”、“治疗”、“帮助”、“制造”等。

随文释义中“词义训诂”部分和我们说的“词义的语境显示”是紧密联系,并有交叉的。但重视语境(组合关系)不等于随文释义。正如宋永培先生在《训诂材料的综合与词义的具体所指》中指出的:“随文释义不但紧紧依附语境,而且由于训释意图的不同,采用的是多种训释方法,又由于时代和方法的局限,加上固守家法师承带来的一些问题,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并非每条随文释义都是对的。”^[18]随文释义更强调内容,组合关系强调在前后搭配组合中决定词义,即更强调形式对意义的制约。

(三)组合关系的历时性

词的组合关系又是有历史变化的,蒋绍愚先生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9]

(1)同一个词,词义基本不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组合关系有所不同。比如,“上”作动词,表示“升、登”之义,从古就有。但是后面直接跟宾语的,在先秦不多。到后来“上”的组合能力大大加强,有了“上楼”、“上车”、“上船”等搭配。

(2)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新词代替了旧词,新旧词的词义相同,但组合关系却不相同,这一点在新词旧词并存于同一语言平面时表现得十分明显。“《祖堂集》中既

有‘木’又有‘树’。‘木’是旧的,‘树’是新的。只有‘树’能和词尾‘子’组合,如‘树子’、‘枯树子’、‘柏树子’,‘木’就不能(但到现代汉语中,‘树’加词尾‘子’的现象也不存在了。)”

四 词义又影响着组合关系

在古代的词义训释中,直训“A,B也”是一种常见的训释方式。A和B并不一定是简单的同义关系或对应关系。蒋绍愚先生在《古汉语词汇纲要》认为,古书的注解往往是随文释义的。“A,B也”中,A很可能是所谓的“上下文意义”(非中心变体)。而B,可能是常见意义(中心变体),如“投袂而起。”(《左传·宣公四年》)。注:“投,振也。”;也可能是上下文意义(非中心变体),如“时则不至,则控于地而已矣。”(《庄子·逍遥游》)。司马云:“控,投也。”在“投袂”中“投”的意思是“振”,也可以说“振袂”。但“投井”不能说“振井”,这时的“投”相当于“跳”,和“振”不是同一个义位了。这样,词义的不同(或变化)就影响着组合关系(“振”可以和“袂”组合,不能同“井”组合)。

在汉语发展的过程中有近义词并列连用而逐渐发展为复合词的趋势,且这种趋势日益加强,这也可以是词义影响组合关系的一个方面。如“解释”、“分解”。

词义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可能性。如时下出现的“吃文化”、“播种太阳”,“送健康”、“非常男女”等,倘能为社会普遍所接受,那就意味着产生了新的词义结构。

[参考文献]

- [1] 王宁. 训诂学原理[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212.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 逻辑学论丛[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3] [14] 王力. 龙虫并雕斋文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80. 333-335.
- [4] 苏宝荣. 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5.
- [5] 张联荣. 古汉语词义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6] [19]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0-47. 280-283.
- [7] 贾彦德. 汉语词义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17-218.
- [8] 张永言. 词汇学简论[M]. 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13.
- [9] 洪成玉. 训诂学和语义学[J]. 古汉语研究,1997,(2).
- [10] “筮”“解”两例说解源于李国英师“《说文解字》研究”课上讲义(未发表).
- [1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12]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印影,1983.
- [13] 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5] 辞源编辑委员会. 《辞源》(合订本)[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16]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Z].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4.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8] 宋永培. 训诂材料的综合与词义的具体所指[J]. 学术研究,2004,(11).

Syntagmatic Relation and Word Meaning

GUO Ling-l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Paradigmatic relation and syntagmatic relation are two basic relations in semantic fiel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egetics has paid some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paradigmatic relation, yet has attached little importance to syntagmatic relation. Many words meanings undergo changes in syntagmatic relation rather than in paradigmatic relation. To analyze word meaning in syntagmatic relation in some ways makes more sense than the interpretation by mea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egetic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egetics can draw related theory from modern semantics.

Key words: word meaning; syntagmatic relation; context; analyze